



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

教材编写委员会 编

开明出版社

KAIMING PRESS

315

2209.2-43
J39(2)

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

教材编写委员会 编



A0932520

开明出版社

教材编写委员会

顾 问:金长泽 孟吉平 瞿葆奎 顾明远 于 漪

主 任:李家庆

常务副主任:刘树信

副 主 任:朱嘉耀 郭涤尘 焦向英

委 员:(按姓氏拼音为序)

曹悦群 陈成祖 陈闽杰 董兆杰 方必福

龚浩康 郭涤尘 郭洪亮 韩燊元 胡安良

黄光荣 黄力林 焦向英 靖永厚 李复兴

李家庆 李有彬 李原静 刘树信 刘振杰

牛佳斌 孙海林 王国璋 王洪玉 王伦元

谢广田 杨想森 俞冬伟 于金海 张克勤

张澍荃 郑次甫 朱嘉耀

秘 书 长:于金海

总 编 务:邵舒竹

编 务:崔 嵘

教材审定专家

(按姓氏拼音排列)

陈美林 丁 忱 段启明 高 原 何雪勤

黄云生 蒋 风 金成梁 匡 兴 赖干坚

李训经 李志阐 刘长安 刘树鑫 刘秀英

梅向明 钱培德 裘宗沪 石生明 童勉之

王金波 王宵骧 王 盛 魏宗宣 奚博先

许自强 殷慰萍 张君达 张炼强 赵总宽

邾 瑭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第一章 先秦文学发展概况

先秦，指我国秦朝以前的历史时期，即从远古起直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按照历史学界的一般观点，先秦包括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形成期的封建社会。先秦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开创阶段，有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上古歌谣和上古神话；有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标志我国古代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体现我国古代散文从发端到成熟，成为后代史传文学、说理散文乃至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有光耀千古、以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成就突出。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主要使用石器工具从事集体劳动，只能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我们从地下发掘的大量石器和陶器中发现，当时人们制造工具或日用品时，在确定形体、运用色彩和绘形画图等方面，都表现了那个时代条件下人们的艺术创造能力和审美观念。如他们把狩猎中看到野兽奔驰的形象绘上了陶器，他们在对某些自然现象观察后，在陶器上绘出了几何形的图案花纹。由此看出，伴随着生产劳动，人们获得了艺术的创造能力。文学的起源也是如此。我国古籍中有一些关于原始社会文学艺术产生的记载。如《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用力时发出的声音），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就是说，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由于需要集体共同用力和工具运用的配合，就会自然地发出协调劳动的呼声。这种劳动号子具有一定的高低间歇，因此具

有节奏感。这就是上古歌谣的起源。显然，这种劳动号子对消除劳动带来的疲劳，对调节、鼓动和组织劳动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当时没有文字，所以上古歌谣产生以后，只能在口头流传。现在从古书中看到的上古歌谣，虽然经过后人的整理加工，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看到上古歌谣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特点。如出自《吴越春秋》的《弹歌》道：“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这里指鸟兽之类猎物）。”这是远古一首猎歌，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社会生活。前两句写制造弹射工具的过程，意为砍竹为弓背，连接两端成弓弦。后两句写射猎，意为弹出泥丸，猎取禽兽。歌谣极简短，两字一音步的短促节奏，与弹射时紧促的声响相关联，语言朴素有力。8个字组成4个动宾结构，概括出与自然斗争的豪迈气概。又如，出自《礼记》的《伊耆氏蜡辞》道：“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是传说中的远古部落名。蜡（zhà），为岁末祭百神祈求来年丰收的典礼。四句意为泥土回到原来聚集的地方去（不要坍塌流失），洪水回到山沟里去（不要泛滥成灾），昆虫不要来危害庄稼，野草杂树都长到沼泽地去。原文是蜡祭的祝辞，实际上却表现了原始人在从事农业生产中要求控制自然灾害的愿望，也表现了他们要求改变劳动条件的理想。全歌都是祈使语气，要大自然听从自己的指挥。这就更表现了先民要征服自然的意志和气魄。至于《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形象地表明最早的文学——歌谣和音乐、舞蹈合一的特点。

由于原始时代生产力与知识水平低下，人们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有许多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于是产生了对自然的神秘感，形成了对自然神的信仰。另外，在原始人群演进为氏族公社后，人们又产生了祖先神的观念。当时，神的信仰在人们意识中占着支配地位。把自然力神化，并借助幻想、想象来表达人们企图解释、征服、支配自然的希望和心愿，就产生了神话。上古神话虽然玄幻神奇，但它来自于现实生活。它曲折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与自然界

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美好理想。如女娲炼石补天、羿射九日等神话，反映了原始人力图支配自然的英雄气概。而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绳为网罟，教民渔猎畜牧，神农氏教民稼穡，发现草药治病等，生动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一些历史阶段的经济生活。上古神话和上古歌谣一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两种文学形式，也是我国最早的人民口头创作。用文字记载下来，那是以后的事情。我国古籍中记载神话最多的是《山海经》，其次是《楚辞》、《淮南子》等书，《左传》、《国语》、《庄子》中也保存了一些。马克思说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因此，神话能帮助我们了解原始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它又充满神奇的幻想，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神话是浪漫主义的源头。后来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如屈原、李白、李贺等都从古代神话中得到许多启发。神话又是我国小说的导源之一。从战国时期运用一些神话传说的素材写成的《穆天子传》，到魏晋志怪小说，直至明、清许多写狐鬼变化之类的作品，都与神话一脉相承。后来一些小说在写法上也从古代神话中得到借鉴、启示。如《西游记》写孙悟空与妖魔的斗争，《封神演义》写“截教”和“阐教”的斗法，与神话中黄帝和蚩尤作战就非常近似。至于民间流传的故事，则和神话相似之处就更多了。

一般认为，我国奴隶制社会从夏代开始。夏禹的儿子启继承父位，从此废弃了氏族社会推举领袖即“禅让”的制度，开始所谓“家天下”，建立了王位世袭制度。相传夏朝传世四百多年。商代取代夏朝以后，奴隶制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清末以来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朝农业已有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生产，农产品的种类也相当多。畜牧业发达，祭祀时所宰杀的牲口一次最多可达千头以上。手工业分工较细，制作技术也较精。青铜器制造的进步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制作最精

的是彝器（贵族在祭祀、宴享、婚丧时所用的器皿）。在出土的彝器中，重达 875 公斤、高达 1.33 米的司母戊大方鼎，形体宏大，气魄雄伟。商代文献最可靠的是甲骨文和“易卦爻辞”。这些文献中，有些已略具文学意味。约 4500 字的甲骨文，是现在能见到的我国较早的文字。我国文字所具有的每个字有其形、音、义的特点，在甲骨文中已经形成。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如诗歌讲求对偶押韵，散文讲求句式整齐，骈文讲求对偶声律，都与我国文字这一特点有关。在甲骨文中已有一些文笔较好的记事句子，如“王其寻舟于河”（《殷虚书契》卷二，六叶，二片），“今夕奏舞，有从雨”（同上，卷三，二十四叶，二片）。《易》卦辞、爻辞与甲骨文一样，用于占卜，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在占卜之际临时写就的，而是长久流传的作为一种有灵验性的兆辞。其中不乏精心之作，常常在几个简短的句子包含了某种生活经验和哲理。如“履霜，坚冰至”（《坤·初六》），仅 5 个字，形象地说明事物将发生变化时，会有某种征兆。又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六》），这里运用生动的比喻说明一旦行动莽撞，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里用鹤的和鸣来为宴饮时的欢乐起兴。显然和《诗经》用兴很相似。总之，在这些文献中，有的已初具文学意味了。

商代末年，统治者十分腐朽残暴，激起人们的反抗。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周初统治者吸取了商代覆亡的历史教训，意识到光靠天命、神权不足以巩固统治，于是提出要“敬德”（《尚书·召诰》）、“保民”（《尚书·康诰》），又反对贵族饮酒逸乐，提倡勤劳，因此，曾经有过一段被称为“成康之治”的社会安定时期。在西周时，具有我国奴隶制特点的井田制和分封制已臻完备。由于大规模地利用奴隶劳动，生产得到显著提高。农业上已具备了后世主要农产品的品种。尤其是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其数量和种类都超过了商代。也正因为如此，西周文化

在吸取前代经验和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获得空前发展。一些文化典籍的产生就是最好的说明。《周易》为古代卜筮之书。至于《诗经》和《尚书》中的《周书》，则集中地反映了周代高度的文化水平。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密切结合的形式。后来乐谱和舞姿失传，只剩下歌词，就成为汉代以来所见到的一部诗集。《诗经》以其巨大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积极影响。它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动后世的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后世的民歌则是《诗经》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时，常以恢复“风雅”为号召，究其实质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就以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的唐代而言，初唐陈子昂在其《修竹篇序》这一诗界革新的宣言书中，批判“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为“风雅不作”，打出恢复“风雅”优秀传统的旗号。正由于他在创作理论和实践上的杰出贡献，奠定了盛唐诗歌的基础。盛唐时，我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为后人树立了典范。而中唐的白居易则在新乐府运动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要求，这正是对《诗经》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进一步发扬。《诗经》中优秀民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文学史上，由于作家们向民歌学习，从中吸取营养，常常形成一个时代文学思想和文学形式的革新，形成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高潮。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唐代诗歌的繁荣，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由诗到词，由词到曲的文体转变，也很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另外，《诗经》中的艺术手法和语言技巧也有很大影响。从《诗经》起始的赋比兴，特别是比兴手法，已成为我国诗歌的一种基本表现方法。而它于偶数句末押韵的方式，确定了我国后来诗歌押韵的基本方式。此外，它还还为后世提供了多种诗歌形式。《诗经》为我国二千多年来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诗歌发展的同时，西周的散文，也在逐步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历史文献。在春秋之前，我国产生了第一部散文的集子《尚书》。《尚书》，即上古帝王之书的意思，亦称《书》或《书经》。它主要记载了殷商至西周时期的典、谟、训、诰、誓、命等官方文告，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是我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其中的文章，结构趋向完整，议论已有中心，叙事也有层次，部分篇章还有一定的文采。例如《商书》中的《盘庚》三篇，是商王盘庚动员臣民服从其命令、不怕劳苦迁都的训辞。全文中心突出，夹叙夹议，还运用了不少比喻。例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等，比喻相当贴切、生动，以此来帮助说理。因此，《商书》是较早、较完整的论说文。而《周书》中的《顾命》写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即位的经过，记叙相当具体完整而有层次，可以看作是较早的记叙文。《尚书》中最后一篇《秦誓》，是春秋时代作品。秦穆公不听谋臣的忠言规劝，执意出兵偷袭郑国，结果被晋打得大败。事后他向臣下表示悔过，经记录成为《秦誓》。在这篇文章中，秦穆公谴责自己，并表达了沉痛之情：“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他悲叹自己犯了过失，浪费了光阴。他在后面还反复地强调应该怎样接受教训。这篇文章运用很多虚字，相当传神，后人读着作品就如听到了作者悲叹之声。这里也可以看出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总的说来，《尚书》还处在散文的初期发展阶段，文辞也古奥难读。无怪乎唐代韩愈虽然提倡写作古文，在《进学解》中还是不免要作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评价了。

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建都洛邑起，至公元前 249 年周朝灭亡，历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前后两个时期。这是我国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时期，是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春秋时代，随着铁器工具开始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经济有

了新的发展。一部分奴隶主除了拥有周王或诸侯所赐的“公田”外，还开发大量荒地作为“私田”，“私门”势力扩张和井田制遭到破坏，使得奴隶制开始瓦解。一些“私门”为了发展其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迫切要求冲破旧社会制度的束缚。经过斗争，他们终于夺取了政权。最明显的是田氏代齐，魏、赵、韩三家分晋。他们建立了新的政权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如魏用李悝，制订了一整套维护新政权的政治法律制度。秦国用商鞅，楚国用吴起，都实行了变法，其中以秦国改革最彻底。当然这些改革的目的都在富国强兵，但在客观上也符合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新兴的封建制一旦代替了腐朽的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力必然得到蓬勃发展。到战国时代，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由于普遍使用铁器，生产方法和效率都有很大的改进、提高。随之，商业也发达起来。那时商业大城市不下数十个。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程度。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给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此外，由于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斗争及其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而又错综复杂，各阶级各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提出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这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又与“士”阶层的兴起有很重要的关系。阶级的分化，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上有了进一步分工，这样就有一部分人来从事精神生产。春秋末，逐渐产生了知识分子阶层，即所谓“士”的阶层。他们出身不同，有的是没落贵族，有的是地主、商人，也有来自社会下层的劳动者，但一般都有一定的学说见解或一技之长。他们纷纷要求参预政治。而当时各国统治者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适应政治斗争的形势，需要有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有人为其出谋划策，因此纷纷招徕贤士。既然各方争相取士，士也就更加竞尚新说，于是游说之风盛行。许多游说之士为了说服一国之君，战胜持不同主张的人，就要剖析事理、陈述利害、援引例证、驳斥论敌，而且要运用语言技巧，说得委婉动听，折服人

心。以上因素决定，我国古代散文在战国时期得以兴旺，并进入成熟阶段。正因为如此，《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又称史传散文）应运而生。这类散文主要由各国史官根据积累的大量资料，经过整理编纂成书，记载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事件以及统治者和策士的言论。与此同时，又产生了体现当时诸子纷起、各学派阐述各自观点和主张的诸子散文（又称哲理散文），主要有《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

就内容、体裁而言，历史散文是叙述历史的，诸子散文则是哲学、政治论文，但二者往往互相渗透。又因为大都采用了文学的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因而两者也都是文学作品。这给后世散文创作以很大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贾谊、晁错等人的政治、哲学论文，都很明显地继承发扬了先秦散文的特点，分别成为历史和文学统一、哲学和文学统一的优秀散文。尽管先秦散文作者的立场、观点、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由于他们真实、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或者针对当时现实，用事实和道理阐述各种思想、观点和主张，因而作品言之有物，从多方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矛盾，也不同程度地揭露了统治者的虚伪丑恶，表达了人民的意愿。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其源多出于《诗》教”，指出了这一时期散文前承《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后启百世的重要历史地位。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具有高度的语言技巧，形成多样的艺术风格，为我国古代散文树立了楷模。成功地运用寓言故事是这时期散文的重要成就和特点。作品所用寓言充满智慧，形象鲜明，短小精悍，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先秦寓言是我国寓言文学的鼻祖，又可以说是小说的雏形。加之先秦散文中提供了素材、形象，乃至提炼材料、刻画形象的方法和技巧，所以这时期散文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滥觞。

在诸子中，荀子不仅写作了大量的政治哲学论文，还创作了一

篇《成相》、二首俚诗和五篇赋。这些作品属于文学范围，反映出荀子的文学修养与成就。其中五篇赋借咏物以为讽谏，开汉代咏物赋的先河，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战国末期，楚国崛起了一种新兴诗体，即楚辞。楚辞原是产生于江汉流域楚地的歌谣，这些歌谣只是一鳞半爪地保存在古代记载中，直到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在楚国文坛上之后，楚辞才成为一代文学形式。楚辞的主要代表作家是屈原，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屈原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创作出《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光辉诗篇。其中《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首政治抒情诗，是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屈原之后，楚辞作者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其中以宋玉比较突出，但他们的作品大都散失了。王逸的《楚辞章句》里只保存了宋玉的《九辩》。《九辩》的艺术风格与屈原诗作相似，后人常把宋玉和屈原并称“屈宋”，虽然其成就并不及屈原，但也说明宋玉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楚辞的产生也和战国时代散文—样，具有革新的意义。它是《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它吸取民间文学特别是楚声歌曲的新形式，把《诗》三百篇，尤其是“雅”、“颂”中的古板的四言诗改为参差不齐、长短不拘的“骚”体诗，以语助词“兮”为显著标志，创造出—种诗歌的新体裁，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新发展。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说明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其“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不仅在遣词造句上，而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成为—种形象体系，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榜样。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代也。”

总的说来，先秦是中国文学从萌芽状态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在

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观念，没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也没有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今天所能见到的作品中，除诗歌的文学性质比较明确外，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就其本来性质而言，都不是文学作品。但在文学的初步发展阶段，许多文学因素正是夹杂在各类文体中成长起来的，而语言表达的技巧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日趋成熟的。所以，先秦文学尽管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但已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它为我国此后二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社会的大变革基本告一段落，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出现，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也就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章 上古神话

神话产生于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是上古先民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原始解释，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他们首先遇到的是大自然的挑战而不是恩赐。原始人类要吃喝以维持生命，却难以经常获取到充足的食物。更严重的是，他们时刻有遭受猛兽袭击的危险，还有不利生存的沼泽、丛林、洪水、干旱、地震等恶劣环境和灾害。一次又一次地应战，伴随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留给他们的是刻骨铭心的生活感受。神话，正是以幻想和想象的方式，记载了原始先民在自然威力和自然灾害面前那种恐怖的心理，但又力图摆脱这种恐怖心理，并渴望改造恶劣生活环境和支配自然力量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神话原是靠口头流传的艺术样式，到了先秦时代，许多典籍开始记录了神话，如《山海经》、《左传》、《国语》、《庄子》、《楚辞》以及《吕氏春秋》等。汉代的《淮南子》、《史记》、《汉书》等，以及魏晋南北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也都记载了大量的古代神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也记录了古代神话，而且《诗经》与神话时代相距较近，记录原始先民心理也较为真实可靠。

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和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知识水平都极端低下，所以当原始先民对那些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自然力无法支配、理解时，或对自然带来的灾难无法应付时，便产生了恐惧心理和敬畏意识。于是，他们把各种自然力量人格化，加以崇拜，如山崇拜、水崇拜、石崇拜、火崇拜等。在保存古代神话最丰富也最接近原貌的《山海经》中，就记载了许多英雄神、始祖神、

创造神以及自然神、统治神、反抗神等。这些神在原始先民的想象中奇形怪状，功用非凡。如“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海外北经》）（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原始的开辟神）又如“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海内东经》）《五藏山经》还记载了祀神的典礼仪式和所用之物，间或也描述了诸山山神的形貌、职司和神力。这些都反映了远古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了人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

神话是幻想的，但这幻想并非毫无现实依据。原始人类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饥荒、干旱、洪水灾祸乃至死亡时刻在威胁着他们。当原始先民耳闻目睹各种可怖的自然现象时，不但幻想出许多体现自然力量的神，也幻想出一些能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英雄。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不仅描述了怪物“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还记载了“禹湮洪水，杀相繇”。因为这些具有超人力量的神话人物是根据原始先民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与提高自身能力的渴望想象出来的，所以狩猎经济的部落创造出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原始农耕时期的部落创造出的神话人物，大多与农业有关；那时的人以弓箭刀斧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成为创造和使用这些武器的能手。

神话中的人物既是原始先民依据对自然和自身的理解想象出来的，他们的形象及其活动就总是和先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以母系血统维系的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到全盛时期，古代神话中就出现了不少女性神话人物，如女娲、羲和（《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她生了10个太阳）、西王母等。她们常常被说成是人类及万物的创造者。在父系氏族公社建立起来以后，原始神话中又出现了众多的男性人物形象，而原有的女性神也纷纷被改塑为男性。在部落、部族出现后，部落或部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些战争又成为古代神话及英雄史诗的重要素材。如古代神话中的共工与蚩尤之

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间的战争神话，便都是先民借助想象对现实生活所作的反映。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一种有翼的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旱神），雨止，遂杀蚩尤。”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中，参战双方不但有人，还有神，和古希腊的神话颇为近似。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先民共同心态的产品。

由于远古时期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先民们在和自然的抗争中不免常常失败。反映到神话中，尽管一些英雄人物常常是人间奇迹的创造者，如女娲取得了“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的神奇业绩，但另一些神话人物却没有这么幸运。如“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夸父逐日，“道渴而死”；鲧窃息壤，被杀于羽郊等。这些悲剧人物所遇到的挫折乃至厄运，正体现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

值得注意的是：神话中的人物在自然界的大灾害面前并不是束手无策，对代表自然力的神更不是退让顺从。如女娃死后化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夸父死后，“弃其杖，化为邓林”；鲧被杀后，更生出一位继续平治洪水的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未竟之业。再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些神话都曲折地反映了原始先民在严酷的自然力面前顽强抗争的精神。神话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全是无稽之谈，但先民们却相信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存在，这就大大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增强了他们最终定会取得胜利的信心。这正是神话的积极意义所在。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伴随而来的人类理性的发展，人的社会行为的价值上升，神对人事的超自然干预作用随之下降。西周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春秋战国时代则出现了更大的飞跃。春

秋前期虢国史嚣提出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的论断，便斩钉截铁地将神排除在社会行为之外，铿锵有力地传递了新时代的信息。于是原始神话一部分被编造成虚拟的古史和上古帝王谱系，一部分被零散地收录到各类书籍中，多数成为阐明观点的论据。不论属于哪种情况，神话中的人物往往依据后起的伦理规范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和原始的面貌有了很大的不同。如伏羲和女娲在早期神话中被说成是兄妹，他俩后来结为夫妇，生育了人类。这在原始社会血缘婚阶段原是很自然的行为，所以那时的人就这样编造。至今汉石刻中还有伏羲女娲蛇体交缠的画像。但在婚姻制度一再演进之后，便成为难以接受的了，于是后人对这一神话不得不加以扬弃。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时，将黄帝描写成“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的天生圣君，对蚩尤则加上“作乱”的罪名。在写到双方战争时，神不见了，只剩下“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的平实纪录。同样，在《夏本纪》中，虽写到了鲧的被杀，但原因却不是“窃帝之息壤”，而是“治水无状”，杀鲧的也不是火神祝融，而是舜。就这样，神话被改编为“信史”。司马迁在删落大量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时作了说明，所持的理由是“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这代表了文明人的共识。这是神话的厄运，又是社会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中国古代神话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对后世影响极大。神话反映了原始社会的文化生活和生产情景，引起了今人的关注。神话描写人类的祖先与大自然的抗争，可谓构思奇特，形象生动，独具魅力，至今仍能给人们以内美和外美的享受。因此，神话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神话的浪漫主义因素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楚辞运用了大量的神话资料，得益于神话奇特的想象而创造出变幻离奇的神话境界，而屈原“九死其犹未悔”的人格魅力更与可歌可泣的神话精神一脉相承。其他像《高唐赋》、